

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成立。其前身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建为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成立后，即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反对独裁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响应“五一口号”，开展新政协运动，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秉承民主科学 创建九三学社

1944年底，许德珩、潘菽、黄国璋等一批为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争取抗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的进步知识分子，在重庆发起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抗战胜利后，参加座谈会的一些人士希望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重庆谈判期间，许德珩、劳君展向毛泽东介绍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并表示打算成立政治组织，但又担心人数太少。毛泽东说：“人数不少，即使人数也不要紧，你们都是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很大作用吗？”许德珩、劳君展深受启发和鼓舞。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了扩大座谈会，为铭记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会议决定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并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委会。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社章缘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及致美国国会电文，选举许德珩、潘菽、张雪岩、褚辅成等人为理事。《成立宣言》指出：“今日适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五四’所号召于国人者，为科学与民主，今时间过去虽已二十余年，而民主与科学之要求，实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基本主张》：促进民主政治之实

九三学社的民主建国之路

□ 孙 信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青年大厦举行

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从速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及农村佃租关系；建立以民生为主的经济制度，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及一切为私人或派系谋利益的经济关系；积极地普及国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反对封建迷信与复古运动；加强同盟国家之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等等。

九三学社的上述政治主张，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方针的精神相一致。从此，九三学社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阵营。

反对独裁内战 力主和平民主

九三学社成立之时，正值全面内战一触即发之际。1946年5月12日，九三学社召开了第一次理事联席会议，讨论了时局与任务，作出如“要求立即停止东北及其他各地内战，取消党化教育”“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蒋挑起国共战争”“协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民团体，一致拥护中共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等多项重要决议。会后，许德珩即奔走于北京、南京、上海之间，联络各地民主力量，共谋反内战大计。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国内战爆发。9月3日，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周年之际，九三学社在重庆发表《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纪念宣

言》，指出“同人等于去年国际民主胜利之日，鉴于今后中国非休养生息，集全力于民主与科学之建设，迎头赶上欧、美不足以言生存，故组织九三学社，冀从此方面有所致力。现为时已及一年，回顾这一年来，内战愈演愈烈，主权丧失不已，经济濒于崩溃，民生困苦已极，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同人等悼此危局，不敢缄默，爰提出宣言，以供国人参考”；主张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协议，解散特务机关，严惩汉奸。宣言发表后，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陈立夫等劝说梁希发表声明否认签名。梁希复信说：“宣言上的名字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矣。”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梁希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的后面，可谓死得其

所，何惧之有？”周恩来得悉此事后，指示地下党组织保护梁希。10月31日，九三学社再次发表六点意见，主张恢复谈判，下令永远停止内战，要求国民党政府从速实施政协决议和“四项诺言”。

国民党在1946年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后，下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单方面指定出席国民大会的增补代表名额。由国民党一手操纵召开的国民大会是违反政协协议的，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民主党派一起强烈反对并拒绝出席。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召开，并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九三学社和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联合发出呼吁书，呼吁全民抵制伪国大和伪宪法。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第二届

“国民大会”即“行宪国大”；同日，北平各大学和天津、南开等5校进步师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九三学社许德珩、袁翰青、樊弘3教授抱着永诀家人、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应邀到会讲演，揭露“行宪国大”的反动实质。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九三学社社员不顾国统区的白色恐怖和镇压、迫害，联合当地民主势力，共同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英勇斗争。

北平和平解放期间，九三学社配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保护学校、保护文化古都，迎接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1月27日，许德珩、张奚若等在徐冰指示下，约请北大、清华著名教授开茶话会，请董必武讲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安定人心，促进搞好大学的积极性。周恩来曾经说过：“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开展新政协运动 参与筹建新中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其第五项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香港的许多民主党派领导纷纷致电响应。因为当时九三学社总社在国统区的北平，“九三学社的领导人物跟北平的地下工作同志是有联系的，曾经掩护过很多的民主运动”还不便以团体

的面目出现”。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1949年1月26日，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及樊弘、袁翰青、薛愚、劳君展、黄国璋、俞平伯、方亮、鲁宝重、楼邦彦、王心正、孟昭威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义发表《拥护毛主席八项主张》；同日，又以九三学社名义在北平《新民报》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指出：“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无反动派参加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同人等认为惟有循此途径始可导中国于民主、自由、富强、康乐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实现”。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许德珩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担任了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的6个工作小组第三组的副组长。在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九三学社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民主党派，作为参加新政协的45个单位之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胜利召开，许德珩、潘菽、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薛愚为代表，叶丁易为候补代表。以其他各界代表身份出席会议的九三学社成员还有：梁希、严济慈、涂长望、储安平、孙荪荃、樊弘、张雪岩、卢于道等。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各个不同革命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方面的代表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合地、空前未有地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有了这种团结，就一定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新中国。

10月1日，许德珩、梁希等九三学社成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自此，九三学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新型政党和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成员，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

汉末三国的历史变迁

□ 曲柄睿

宦官与外戚斗争的 总爆发

黄巾起义的爆发标志着东汉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但是在洛阳的宦官集团并没有意识到东汉社会的危机，依旧我行我素。

汉灵帝重用张让、赵忠等中常侍，他们“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贱，为人蠹害”。郎中张钧指出，张角之所以能够号召起广大民众，关键在于中常侍们“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权利，侵掠百姓”。正因为百姓冤屈又无所告诉，所以才谋议不轨。听到这样的话，汉灵帝反而斥责张钧“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张让授意御史诬陷张钧学黄巾道，拷问致死。实际上，张让等人并非汉之纯臣，他们反而与张角有所联络，预作身后计。宦官们以黑为白，指鹿为马，善诬作恶，佞转为忠。东汉末的政治，竟然如此荒诞。

这之后，宦官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趁着重修洛阳南宫的机会，征发郡县材木，借机聚敛。汉灵帝出身贫寒，登基后大肆卖官。他要求迁转官吏按照职务高低缴纳费用到宦官处，名曰“助军修宫钱”。灵帝甚至说出“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的话来。凡此，均为执政的外戚和有正义感的士人所不满。

汉灵帝驾崩后，由外戚大将军何进辅政。何进是屠户子，出身卑微，有杀宦官以收天下人望之心。这时，代表着士人向背的中军校尉袁绍同样建议何进诛杀宦官，二人一拍即合，外戚与士人站到了同一战线上。

至于如何诛杀宦官，士人与外戚发生了争执。袁绍本来建议何进挟帝舅之威，率兵直接将宦官杀尽。何进之妹何太后却顾忌宦官势大，不能一时尽除。在此犹豫之际，袁绍又建议何进召集四方猛将带兵来洛阳，造成清君侧的声势，迫使太后同意诛除宦官。

袁绍的这个主意实在是昏庸透顶。大将军主簿陈琳就认为何进此时诛杀宦官乃是顺天应人之举，倘若连接外兵，则会面临强者为雄，授人以柄的危险。归根结底，何进只有暂时的权势而没有真正的才能，凭借皇帝新死的过渡阶段，还能做几件随心所欲的事；倘若将各地豪杰召至京城，

大家发现何进不过是个空架子，难保不会另起事端。

何进的弟弟何苗更是懦弱，他劝说何进，你我本来出身贫贱，依仗宦官之力方有今日之富贵；国家大事谈何容易，不如与宦官讲和。

何进的犹疑给了宦官喘息的机会。张让等人诈称皇太后诏，诱何进入宫，将其挟持。何进死前，听到宦官的诘问“天下愤愤，亦非独我曹罪也”，“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虽是强辩，却也不无道理。

张让等杀死何进，袁绍等人率兵入宫杀尽宦官，宦官与外戚的斗争终于以两败俱伤的总爆发收场。此时董卓已经来到洛阳，接收了胜利果实，控制了朝政。他面对的是一个既没有外戚、也没有宦官的新格局。

董袁曹之争

董卓专制朝政，引发了士人的不满。董卓自知要在朝中立足，必须团结士人。于是他先为陈蕃、窦武及党锢之祸波及的诸多士人恢复名誉和爵位，擢用他们的子孙。董卓还将士人安排在朝中和地方上做官，比如伍琼、郑公业等人做了侍中、尚书，韩馥、刘岱等人担任刺史。

董卓如此安排，没有收到人望，反而起了反作用。他安排的地方官甫一到任，就组织兵力反对他。因为董卓毕竟不是士人出身，士人们此时瞩目的领袖，乃是袁绍。

袁绍是袁安的后裔。他深知在汉末外戚、宦官并逐的时代，遵守名教方能获得最大的道德力量。果然，袁绍为母亲服完三年丧期后，又为在自己幼年时代就去世的父亲追服三年丧。六年的庐墓生活一定是孤单枯燥的，可此举与宦官和外戚声色犬马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更何况袁绍出生于一个四世三公的家庭，本就是贵公子，能够如此砥砺名节，实在是大有抱负的青年。当袁绍结束丧期移居洛阳时，拜访追随他的人填接街陌。加之袁绍容貌不凡，与士相接时又能倾心折节，因而大为天下士人激赏。

董卓控制朝政时，要行废立事，袁绍表示异议。董卓说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也勃然怒道：“天下健者，岂惟董公！”从此

流亡冀州。董卓慑于袁氏为士人领袖，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以渤海为基业，袁绍连接袁术、韩馥、孔伈等地方实力派起兵反董。袁绍被诸人推举为盟主，他成为士大夫们公认的领导。

袁绍代表了汉末士大夫阶层，他们多为地方豪强大族，恪守礼法，举止动作都要合于儒家道德。这一批人坐而论道很有一套，在朝廷上仗义执言也很了不起，可行军打仗非其所长。东汉末年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士大夫阶层一直处于劣势，他们并非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们无力改变东汉政治的混乱局面。袁绍的登场，同样不能带来多少起色。

袁绍的联军中有曹操。曹操也是贵公子，他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所以曹操名义上是宦官之后。在重视名节的汉末，宦官之后的出身带给他的只有社会上的鄙视。曹操偏偏不愿意顶着宦官干孙子的名义苟活于世，他20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即负责首都北部区域的治安。汉灵帝宠爱的小黄门蹇硕的叔父违法于夜间出行，被他抓获，当即棒杀。换言之，曹操虽然出身宦官家族，但是他本人有明确的是非心，不愿与宦官同流合污。

进一步讲，出身虽然不很光彩，但是曹操为人干练明敏，不像士人那样有很多条条框框限制，在乱世中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反而能干出一番大业绩。陈寅恪先生就总结说“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很可以概括袁曹的区别。

反董联军一事无成，内部反生许多嫌隙。董卓死后，群雄并起，曹操袁绍这对过去的盟友隔黄河为限，双方的对立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政治上的。袁绍代表的儒学大族要求维护豪强利益，施政尚宽，实际上走的还是东汉的老路。曹操代表的一派要求加强中央集权，施政尚严，侵夺了大家族的利益。

经过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击败了袁绍，此后又统一了北方，代表着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不过，豪强势力已经发展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曹操在世时尚且能凭借个人威势对其加以限制，曹操死后，豪强的力量终于突破重重禁网，成为左右时代的决定性因素。



天下三分

汉末三国的历史经由各种曲艺形式得到传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诗。人们基于忠奸善恶的价值判断，形成了对那个时代的主流认识。如果注目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可以发现魏蜀吴三国建立在近似的社会基础之上，虽然不同政权内的问题表现形式不同，其实质却一致。曹操、刘备和孙权建立的割据政权虽然各有各的区位优势，但面临的共同问题有两个，其一是豪强大族的分离倾向，其二是劳动力的匮乏。哪个政权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哪个政权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曹魏土地广大，但人口却称不上众多。曹操诗作称“铠甲生虱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丕诗称“丧乱悠悠过纪。白骨横于万里”；曹植诗言“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父子兄弟三人经行中原，目睹竟是这番景象，令人心怀感伤。不得不叹人口减少和社会生产的倒退是东汉末年动乱的恶果，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曹魏政权必须抓紧恢复生产。

曹操推行了屯田的办法。本来屯田是汉朝在边境地区实行的办法，士兵战时作战，闲时生产。面对中原荒芜的现实，曹操将屯田的办法移到了内地。他先在许昌周围开垦土地，后来又将此制度推广。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民屯中政府与民众的收成分配，其实维持了汉代租税比，可以说割制

并不是很酷烈。曹操还实行了士家制度，所谓士家就是兵户。兵民异籍，一人当兵，父死子继，世世不易。这个制度无疑非常残酷。自耕农为了逃避战争，往往选择依附到豪强名下，成为依附民。豪强与政府抢夺劳动力，是当时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割据江南的孙吴政权同样面临豪强林立及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孙吴政权在江南根基不深，也缺乏曹操那样的强大实力，加之江南地区发展水平较中原为低。于是孙吴采用的办法就是承认豪强的既得权益，与他们联合统治。至于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则通过征伐山越，迫使隐居山中的汉民和各少数民族迁居平地加以解决。

刘备政权的基底是荆州豪强，他征服益州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协调荆州来的豪强——“客”与益州当地豪强——“主”之间的矛盾。刘备临终时同时将诸葛亮和李严任命为顾命大臣，当然就是以二人分别作为客和主的代表加以平衡。

三国的建立根源于汉末的特殊历史情形，又由此衍生出了新的问题。曹魏政权最终被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司马氏政权取代。西晋虽然重新统一全国，但是它的统治力却不能恢复到汉或者曹魏那样。

两汉风云